

第一章 少年阴霾

米歇尔·福柯于 1926 年 10 月 15 日出生在法国维埃纳省省会普瓦捷的一个医生家庭，直至 19 岁才离开。这一简单事实向我们提示了两个重要的时空维度。从空间看，如福柯自己所称，他“小时候生活在法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外省环境里”^[1]。从时间看，他属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长大的一代人。

成名后福柯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偶尔谈起来，也往往出言不逊，鄙夷与忿忿之情似乎难以平复。这使我们从中窥见到宁静而窒息的外省生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冷岁月对他的深刻影响。

从法国首都巴黎乘开往西南方向的火车或汽车，经过三百公里的路程，便抵达福柯的故乡普瓦捷。福柯后来以否定的口吻称这是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头脑禁锢”的外省环境。

普瓦捷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市。翻开 1984 年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普瓦捷一名源出于最早在此定居的高卢部落名称。公元 4 世纪为基督教中心。5 世纪哥特人到此定居，507 年被法兰克国王逐出。

732 年法兰克统治者在附近击败萨拉森人。1429 年 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在这里受审讯 经 16 世纪繁荣时期后，城市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城市部分被毁。最古老城区有许多错综起伏的街路，四周有沿古代城防工事修建的林荫道。圣母大教堂是罗马式建筑的典范。4 世纪建成的矩形圣让洗礼堂可能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型基督教建筑。公路、铁路交通设施完善，为一商业和行政中心。工业（主要为印刷和橡胶业）发达，郊区发展起电机和化工业。人口 76793(1982 年)。”

这段文字大体上也适用于本世纪上半叶的普瓦捷。当时，这个城市更带有明显的外省特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口不足四万。工业尚不发达。当地盛产各种酒类。城市的财富主要靠地产和农业。城里有一所 15 世纪建立的大学，后来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改造，设立了法律系、文学系和理学系，其中法律系较为有名。另外设有一个从属于法兰西大学的医学院，只提供三年（相当于大专）的教学课程。政治上，温和保守派占上风，与之相颉颃的教会势力也很强大。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古香古色、风景秀丽、和平安谧的小城，也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市民—资产阶级社会。

福柯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而且都使用同一个名字：保罗·福柯 (Paul Foucault)。曾祖父不慕荣华，居住在当时巴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农泰尔为穷人治病。

外祖父普罗斯派尔·马拉派尔 (Prosper Malapert) 是普瓦

捷的一个著名医生，独立开业，而且在当地医学院教解剖学。他很富有，拥有地产，还在距离城市中心不远的火车站附近修建了一幢带有小花园的住宅。他有两儿一女。一个儿子是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晋升为上校团长。另一个儿子研究哲学，在巴黎一所公立中学任教，发表过不少论著。

福柯的父亲保罗·福柯 1893 年出生于巴黎东南的著名城镇枫丹白露，后迁居普瓦捷，同普罗斯派尔的女儿安娜·马拉派尔 (Anne Malapert) 结婚。他同岳父一样，在医学院教解剖学，除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外，后来又继承了岳父的私人诊所。保罗·福柯既是拥有两个诊所的医生又是大学教授，因此享有一般医生不能相比的显赫声望，成为当地的社会名流。安娜·马拉派尔继承了很大一笔遗产，包括地产。她很能干，主要管理家务，还协助处理丈夫的医疗事务。

保罗·福柯的家庭属于当地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住在岳父留下的住宅，在离城二十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所自己的住宅，周围被一片园林所环绕。当地农民称这所住宅为“城堡”。保罗·福柯雇佣着秘书，家中有几个仆人，包括保姆、厨师、汽车司机。

说到法国“资产阶级”，许多中国读者马上会想到巴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或者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葛朗台。其实，这种意象有很大的片面性。在西文中，资产阶级这个词是从市民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在西欧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那部分尤其在外省是那种勤勤恳恳、正派体面、信仰虔诚、观念正统的富裕市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中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而这种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往往是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他们尊奉的是当年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2]。当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医生等自由职业者阶层在宗教信仰方面不算太虔诚。因此，更宽泛地说，资产阶级的准则是“财产，家庭，道德，秩序”。如果在文学艺术中找形象的图解，那么一些画家创作的市民风俗画更贴近他们的真实境况。

保罗·福柯的家庭正是浸透着这种资产阶级伦理。保罗·福柯埋头于工作，靠自己的职业维持一个体面的身分。保罗和安娜生有三个子女。米歇尔·福柯是长子。按照福柯家的传统，长子应该用“保罗”做名字，但是在安娜的坚持下，起名为“保罗-米歇尔”。他有一个比他大 15 个月的姐姐弗兰仙 (Francine)，还有一个比他小 5 岁的弟弟德尼 (Denys)。孩子们过着衣食无虞但绝不奢华的生活。母亲向他们灌输外祖父的人生箴言：“管好自己的事。”因此，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了个人奋斗的精神。福柯在少年时代有一个自己的书房。但这间书房到冬天也不升火，很像是花园里的一个简陋窝棚。

福柯后来说：“凡是在二战以前或二战期间在一种天主教环境里养育大的儿童，都有这样的经验：有许多不同的说话方式，也有许多沉默的方式。沉默有时候意味着视若仇讎，有时候意味着深厚的友谊、衷心的赞赏乃至热爱。……说话、同客人交谈的规矩，在我看来，既十分奇怪，又十分讨厌。当时我常常想，人为什么必须得说话。沉默似乎是同

人打交道的更有趣的方式。”^[3] 因此，孩子们特别喜欢家里宴请体面的宾客。在这种时候，他们就可以单独吃饭，免去那些繁琐的礼节。

福柯所说的“天主教环境”是一种泛指。福柯的父母名义上仍是天主教徒，但不常参加教会仪式。孩子们当然都接受教会的洗礼。外祖母也经常带孩子们参加星期日的教堂弥撒。但父母的宗教态度对孩子们有很大影响。福柯从小没有那种宗教压抑的精神创伤。

福柯后来激烈地抨击现代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disciplinary institute)。这也许是与几乎一生都在这种机构中度过有关。他对现代教育体制有着深切的体验。福柯不到 4 岁就被送进普瓦捷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小学部。入学的法定年龄是 6 岁。当时家里送弗兰仙上学，童稚的福柯依恋姐姐，难舍难分。经母亲同教师协



福柯 1935 - 1936 学年在普瓦捷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小学部（后排左五）

商，允许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玩弄彩色铅笔。从 6 岁起，他正式上学。六年后，他升入同一所学校的中学部。当时，上中学需要交学费，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才能供养得起。

关于这一时期的经历，福柯临终前在医院里回忆起三个“可怕”的印象。

第一个可怕印象：一次，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进普瓦捷医院的手术室，让他在一旁观看截肢手术。鲜血淋淋的场面使他惊悚。

第二个可怕印象：当地有一个神秘的庭院。1901 年，警察发现里面有一个被囚禁了几十年的妇女。她是一个富人家庭的女儿。她在 25 岁时偷尝禁果怀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家人为了掩盖丑闻，宣布她神经失常，先后把她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把她关在一间悬挂草帘的黑屋子里。事情曝光后，当地报纸称她为“普瓦捷的囚徒”。1930 年，著名作家纪德以此为标题，将有关资料汇集成书。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福柯每当路过这个庭院，看到依然悬挂着的草帘，就唤起恐怖的形象。

第三个可怕印象包含着福柯的内疚。1940 年，福柯 14 岁时遭受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他一直是一个好学生，除了数学成绩不算太出色，法语、历史、拉丁文、希腊文等课程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德国入侵法国，班上突然插进一些随父母从巴黎逃难来的犹太学生。这些插班生学习优异，趾高气扬。福柯的名次顿时下降。福柯当时对这些犹太学生恨之入骨，用一切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时

隔不久，他看到这些孩子神情沮丧地被押送进集中营。^[4]

福柯不仅名次下降，而且成绩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也有人解释说，当时的法语教师思想激进，厌恶名门权贵及其子弟，对福柯态度不好。福柯的情绪大受影响。期末考试时，除拉丁文外，其余各门功课都不及格。学校要求他开学后补考。

福柯被迫转到一所由耶稣会主办的教会中学——圣斯坦尼斯拉斯学院。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次转学是福柯母亲为保护福柯而采取的行动。但是，据福柯自己的说法，是父亲对他的学习成绩感到恼火而把他转到“他所能找到的最严格的天主教学校”^[5]。福柯不喜欢这个学校。他后来说，这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于他不啻是一种“折磨”。

据福柯的母亲说，该校的历史教师蒙萨伯尔对福柯有很大影响。蒙萨伯尔是本笃会修士，经常徒步周游，朝圣进香。他见多识广，讲课生动形象，妙语连珠，既善于描述细节，又不时流露出机智深刻的见解，受到学生普遍欢迎。福柯从幼年起就对历史萌发了兴趣。他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很可能最早得益于这个老师。

1942年，福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第十二年的学业，进入了“哲学班”。按照法国的教育制度，中学设立的“哲学班”是为中学毕业会考（又称“业士学位考试”）做准备的，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文科班。顾名思义，哲学班的主课是哲学。哲学教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接替的教师更擅长于文学而不是哲学。他在课堂教学中仅仅是解释教学大纲。但他在课余时间很愿意同学生展开广泛的讨论。他后

来回忆“少年福柯”时说：“我可以把我教过的所有哲学学生分成两类。第一类学生总是把哲学当做求知对象，他们喜欢钻研宏大体系、重要著作。另一类学生对个人焦虑的问题更感兴趣。第一种学生带有笛卡尔的印记，第二种学生带有帕斯卡的印记。福柯属于第一种。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求知欲望。”如果结合福柯后来的思想发展看，这一印象恐怕是惑于表象或失之片面了。在福柯的强烈求知欲和严肃性格背后无疑也有着被压抑的个人焦虑的冲动。

福柯的母亲认为替补教师不太合格，又为福柯请了一个大学二年级哲学系学生当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后来谈起福柯时说，在他所教过的学生中，福柯可能不是才华最出众的，但是在敏于领悟和善于归纳方面，福柯是无与伦比的。

1943年，福柯顺利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了报考大学的资格，面临着专业和前途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父与子的尖锐冲突。父亲维护家族的传统，要求长子学医，将来也做一名医生。但是福柯对文学和历史更感兴趣。他声称将来从事政治或新闻工作。母亲尊重儿子的意愿。父亲只好让步，把子承父业的希望转到小儿子德尼身上。

如果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角度看，福柯很典型地体现了俄底浦斯情结，即恋母弑父情结。他对母亲始终保持着尊重和依恋的情感。他把自己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的第一本书献给母亲。但是他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后来福柯多次同朋友表露他对父亲的怨恨。他甚至说，父亲是一个

“恶霸”，对他实行“规训和惩罚”。这种关系最明显的证据是，福柯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保罗-米歇尔·福柯”而自称“米歇尔·福柯”。

福柯的目标是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简称“高师”）。巴黎高师和巴黎综合工科学院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根据国民公会 1794 年的命令建立的，旨在培养共和国需要的新人才。巴黎高师毕业生的前程一般都很光明。高师的宗旨是培养中学教师。19 世纪末第三共和国初期，执政的共和派为了清洗保皇派、巩固共和国，选用高师毕业生进入政府机关，尤其是外交部。为了削弱教会的影响，推行教育世俗化，共和派着力提高公立中学教师的地位。高师的毕业生无论做教师还是从政，社会地位都很高。这所学院也是思想家的摇篮。在 20 世纪法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有许多毕业于这所学院，如柏格森、萨特、梅罗-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迪梅齐尔、康吉兰、伊波利特等等。因此，高师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许多有才华的中学生都把进入高师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

法国中学教师的这种特殊地位也同法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制度有关。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法国教育制度中最高等级的考试是教师资格会考。这种考试非常严格，包括口试和笔试。通过考试的人既可以在大学任教，也可以到公立中学教书。公立中学的数量很少。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每年由教育部任命的公立中学教师只有几十名。因此，在许多地方，中学教师也属于社会名流。法国现代思想家雷蒙·阿隆曾指出：

“(在法文中)教师和教授是同一个词,既适用于大学的学官大人,也适用于大学教师资格获得者(或者中学教师资格获得者):他们有时在中学初中部给小孩子和青少年上法语、数学以及历史课。这种词汇上的特殊情况很容易解释:公立中学的教师们一点也用不着羡慕大学学院里的同行们。在哲学界亨利·柏格森和布伦什维格都在公立中学教过几年书。伊波利特也是如此。”^[6]此外,还可以加上萨特。萨特只在中学教过书,从未登上大学讲台。

高师每年只招收不到 40 名学生。入学考试极其严格,竞争十分激烈。准备报考高师的学生都要再上两年制的预备班。圣斯坦尼斯拉斯学院没有这种预备班。福柯进入普瓦捷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附设的预备班。^[7]

在预备班学习期间,除了历史之外,福柯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哲学教师让·莫罗-雷贝尔(Jean Moreau-Reibel)。后者毕业于巴黎高师,曾在克列蒙-费朗大学任教。他的课堂教学比较凌乱,但他的对话式教学方法很能吸引学生。福柯是课堂上最适应这种教学方法的学生。他在回答问题时比其他同学更能抓住要点

福柯学习极其刻苦,几乎总在读书。他从小就陷入了一种书本生活。他后来曾谈到自己从童年起经常重复的一个恶梦:“我眼前摆着一本读不懂的书,或者我只能读懂其中一点儿。我装作读书,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在装样子。然后,书上的文字就模糊成一片了。我根本读不成了,也不能装模作样了。我感觉喉咙难受,就醒过来了。”^[8]

也许是由于这种书本生活，福柯显得很严肃，也很孤僻。他很少和其他同学一起散步聊天，更不用说玩闹嬉戏了。但是在偶尔举行的同学聚会上，他也能调侃，开怀大笑。有时他还把自己的笔记借给其他同学。

尽管学习很紧张，福柯仍有时间阅读文学书籍。他很喜欢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纪德的作品。福柯还写过诗。但是在他去世后，没有任何诗稿留下，可能都被他自己销毁了。

这时战争还没有结束。自 1940 年以来，法国北部被德军占领普瓦捷没有遭受战火，但也曾被德军占领了几个星期。维希政权的警察统治如黑夜笼罩巡逻队的皮靴声在大街上回响。熟人被捕和失踪的情况时有发生。普瓦捷是农业区，食品和燃料供应比巴黎要好，但人们也越来越深感匮乏之苦。福柯一家没有卷入抵抗运动，但是对维希政权也没有好感。福柯的母亲稍微有些亲英倾向，因此全家有时偷听英国 BBC 的广播。在预备班里，由于家庭政治背景不同，即便是在聚会时，同学之间也不谈国事。但是面对强暴的压抑，反抗情绪在滋长。有一次，一些寄宿同学到附近军队驻地偷木柴。为了保护受怀疑的同学，福柯和另一个同学挺身而出，声称是他俩找来的。这件事没有受到追查不了了之。

对于法国人民在纳粹统治下从默默顺从到逐渐参加斗争的集体经历，福柯后来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压迫造成的苦难，“是劳工

阶级的主要经验”。因此，民众不愿同资产阶级合作，不愿“投入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8]，对国家提出的投入武装斗争的要求，采取一种不顺从的态度”。但是在纳粹崛起以及西班牙内战之后，“是劳工阶级的再政治化、再动员的过程，以及逐渐萌发的战斗意识。……在 1939 年的巨大梦想（1940 年即遭粉碎、破灭）之后，民众已放弃了抗争。这种过程确实一度发生过。但它只是另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这一历史过程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刚开始是厌恶战争，但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终于激发出了一种需要展开斗争的高度自觉。”人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两码事。福柯认为这是“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记忆”^[9]。

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给福柯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几次谈到这种影响：“我记得，我经历的第一次大恐慌是奥地利陶尔富斯总理被纳粹暗杀。我想那是 1934 年的事。这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现在几乎没有人还记得陶尔富斯被暗杀的事了。我记得，我当时确实被这件事吓坏了。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对死亡产生强烈的恐惧。我还记得从西班牙逃到普瓦捷的难民。我记得在学校里与同学为埃塞俄比亚战争而争论。我想，这一代的少男少女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战争的威胁就是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存在的架构。后来，战争真的来临了。不是家庭生活，而是这些世界性的事件才是我们的记忆中的主体。我说‘我们的’因为我几乎敢断言当时法国

的少男少女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的私人生活实际上是受到威胁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历史，对个人经历同我们置身其中的事件的关系特别着迷。我想，这就是我的理论兴趣的核心。”^[10]

“我当时不知道我的一生应怎样度过。我想，这在我那一代是很典型的。当我 10 岁、11 岁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成为德国人还是依然做法国人。我们不知道，在轰炸等等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会死去。当我 16、17 岁时 我只知道一件事：学校生活是一种能够免受外在威胁、远离政治的有保护的环境。因此，我一直喜欢生活在被保护的学术环境里，知识环境里。知识对于我来说应该具有保护个人生存、理解外部世界的功能。我是这样看的。知识是一种通过理解而求生存的工具。”^[11]

“至今我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觉得这是一个绝对充满威胁的世界，它能把我们碾成齑粉。作为一个少年而生活在一种必然完结、必然导致另一种好坏未卜的世界的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童年完全是在期待着黎明的夜晚度过的。憧憬另一个世界的前景，是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我们或许过于怀有一个末日启示的梦幻。”^[12]

在种种外在威胁中，法西斯主义成为福柯终身思考的一个主要对象，因为福柯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大众集体的暴力。福柯认为：“用‘独裁专政’这个字眼来形容纳粹主义，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真实的，但若相对来看，则变得虚假不实。你只要想想一个人在纳粹政权底下，只要他是个党卫军人，或者签名加入国社党，就能获得的权力吧！在现实

中，你就可以任意杀害你的邻居，强占他的太太、房子。……事实上，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专制独裁’——某一个人的权力——正好相反，你可以说，在纳粹这类政权下，权力最为人所厌恶、所憎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令人陶醉、沉迷的部分）是被赋予了相当多数的民众。”^[13]只有在民众内部仍有相当多数的人行使着国家机器进行压迫、控制、统治等诸多职能的情况下，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才有存在的可能。我相信，这是纳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它已深入地渗透到群众内部，而且一部分权力实际上分派给一些特定边缘的群众。”^[13]

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深刻根源乃在于人的无意识的权力意志。他表示，他所说的法西斯主义“不仅指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而且指我们所有人心中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正是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喜爱权力，欲求一切支配和剥削我们的东西。”^[14]福柯的这种理论和历史思考也包含着对自己的反省。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法国很快获得解放。

1945年春夏之交，福柯在考场上遭受第二次重大挫败。他参加高师入学考试。全国有100名考生通过笔试，获得赴巴黎参加口试的资格。普瓦捷的14名考生有两人入围而福柯名列第101名。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名次，但痛定之后也还能给人以慰藉和勇气。

福柯决定来年再考。通常，考上高师的学生大多出自巴黎的亨利四世公立中学或路易大帝公立中学的预备班。

但这两个学校一般只接收近处的学生。经过父母的活动，特别是母亲的努力，1945 年 10 月，福柯插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预备班。这一年，福柯 19 岁。

福柯的青少年时代结束了。如前所述，福柯自己后来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几乎都是阴暗的：保守、压抑、威胁、恐怖。这种体验塑造了他的人格，影响着未来的思考。有人概括说，少年时代的福柯似乎“像查拉斯图拉一样忍受着一种强烈而高傲的孤独之苦”^[15]。

【注释】

- [1][3]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 - 1984*, ed. by Lawrence D. Kritzm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3 - 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12 页
- [4][5] Miller,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pp.335 - 336, 39.
- [6] 雷蒙·阿隆著、孟宪如等译：《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428 页。
- [7] 这里采用 D. Macey 的说法。D. Eribon 的说法是，福柯进入了普瓦捷科学院附设的预备班。见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
- [8] David Macey,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Hutchinson, 1993, p. 14.
- [9][13]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6 - 1984* 中译文参见《电影与人民记忆——电影笔记 访福柯》载《电影欣赏》(台湾)第 44 页。

-
- [10][11] Foucault, *Politics . Philosophy, Culture :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 1977 - 1984*, p. 7.
- [12] 同 5]c
- [14] Foucault, Preface to G. Deleuze and F. Guattari . *Anti-Oedipus* ,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 p. xiii.
- [15] Arthur Goldhammer 的概括, 转引自 Miller,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 p. 39.

第二章 巴黎求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进入一个兴奋和迷惘共生，苦闷和期望交集的时代。

法国从德国占领的痛苦深渊中解脱出来。但是，战争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法国城乡满目疮痍，内外危机频仍。经济凋蔽，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黑市猖獗。法国右翼因战争期间助纣为虐而受到谴责，名誉扫地，四分五裂。参加抵抗运动的各种政治力量趾高气扬，党派争执十分激烈。戴高乐说：“1944 年时，法国人是不幸的，现在他们是不满的。”^[1]

法兰西殖民帝国也开始崩溃。海外领地烽火延绵。1945 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也相继爆发了反对殖民主义的起义。其他法属殖民地也动荡不安。这在法国国内激起各种反应。

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更为严重。法国人在两个方面深感屈辱。首先是在战争期间的不光彩表现。在战争初期，举国上下意志消沉，不战而降。军队一溃千里；民众手足无措。有人回忆说：“年终上最后一课时，我们的文学老师对我们说：‘做一个法国人我觉得羞耻。’他哭了。”^[2]而且，在占领期间，面对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许多人漠然处之或